

奥尔波特等 著

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鹂 译

赵元村 审校

谣言心理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谣言心理学 / (美) 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
黄鹂译；赵元村审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88-4

I. 谣… II. ①奥… ②刘… ③梁… ④黄… ⑤
赵… III. 谣言—社会心理学 IV.C9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205 号

学 术 策 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 库 工 作 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 术 编 辑	吴光前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13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9.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原著序

大部分日常社交谈话总包含着谣传。日常生活中，我们与朋友聊天时，也充斥着各种有根据或无根据的小道消息。毫无根据的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偶然性的谈话，其目的不过是与朋友打发时光。我们传播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跟无意识地问候“早上好，天气不错！”一样。

这种社交谈话只是向我们的对话者表达一种含糊的友好感觉，避免沉默的尴尬，它们只是谣言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大多数谣传和小道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它们有深切的目的，有重要的感情上的目的。只是说者和听者通常无法表达出来，他们只知道这种流言对他们很重要。它似乎能不可思议地缓解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焦虑。

虽然谣言的散布，一直是重大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每当社会局势紧张，不实的报道便恶毒地增长。在战时，谣言或散布不必要的担忧，或夸大希望，从而使道德遭到破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它们威胁着军队情报的安全，尤为有害的是，它们传播敌视和仇恨国内本地驻军的有害偏见。战后谣言的破坏性影响仅稍轻于战时。

正是战时谣言问题，促使我们着手本书中叙述的研究性调查。但是，当我们开始分析与战争及和平年代流言散布有关的试验时，却苦于缺乏系统描述该课题的社会心理学文献。至今，似乎无人尝试对谣言的基本现象作统一协调的描述。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基础教科书的形式，将所有与此重要课题有关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谣言都不应仅仅被看成是纯粹的怪物，是人们

在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中，奇特但无价值的一种偏离。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谣言原则被广泛应用，它在回忆、忘却、想像及文饰作用方面典型的歪曲过程，与我们在人们的交流形式中发现的歪曲过程非常一致。例如：传奇故事，它们是某个家庭、部落或民族的人文精华和英勇行为或事件的永恒传说。保存传奇故事的目的，以及它们流传变化的过程，与那些转瞬即逝的谣言传播时所产生的现象基本相同，在法庭证词中，在向朋友描述过去的经历时，在俏皮话和自传中，在谚语、格言和传记中，甚至在历史著作和艺术创作中，我们也发现与存在于一般谣言歪曲中相同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起作用。对个人和人文内容进行省略、突出、同化的趋势，存在于所有不受客观事实标准严格限制的人类交流形式中。

虽然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试图指出谣言原则的更广泛应用，但绝大部分篇幅将集中在那些未经证实的通常被称为谣言的主题，通过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范围更窄的例子上，希望他能精通其中所包含的规则，从而自如地运用到人类交流的所有相关形式中。

我们将使用的“谣言”一词，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

任何谣言总暗含着传播一些真相的意思，即使传谣者在趣闻的开场白中提醒说“这仅仅是谣传，但我听说……”，里面也含有这种意思。

传播的媒介通常是口头语言。确实，谣言偶尔也印在报纸或杂志上，或者传播于电波中，但是，负责任的出版者和广播电台正学着控制那些道听途说的报道，尽量避免传播谣言。而另一方面，诽谤的小册子和不负责任的出版物是有害谣言的常见载体。

我们的定义将集中于“谣言一般是特殊的和有关时事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也正因如此，谣言通常是暂时引起人们的兴趣。谣言来来去去，有时候同样的谣言反复出现，但它们几乎总是与事件或人物有关，一则谣言的主人公通常很容易识别：某先生啦，一位电影演员啦，俄国人啦，隔壁搬来的陌生人啦，某联邦机构等——这些都是谣言的典型目

标,有少数谣言没有人物和明显的受害者。还有少数谣言不能明确说明谣言大意的行为或事实的性质。对事件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诋毁,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希望或灾难性的预言,都是谣言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们对谣言定义的中心特点坚持认为:谣言仅在缺乏“证据的可靠标准”时盛行,该标准使谣言区别于新闻和科学,使欺骗区别于知识。确实,我们不能总是很容易知道证据的可靠标准何时出现。正因如此,我们不会总能分别哪是事实,哪是想像。刊登在一家声誉卓著的报纸上的、标明日期的、所有读者都可看到的新闻,通常可以作为证据的可靠标准。但是,当告诉朋友这则消息时,偏离了印在报上的内容,谣言便由此产生。如果我们口头表述与报上所说的一模一样,那就没有谣言了——当然,除非最初的新闻本身就背离了证据的可靠标准,或它本身就是谣言。

因此,为了判断我们听到的是信息还是谣言,我们必须先判断描述离它所依据的证据是近还是远。在谣言中,证据的来源越来越模糊,经常退至什么也没有、至多不过是“他们说……”,尤其是当证据的标准是由一个代词出现时,肯定是谣言。有时候证据的标准难以捉摸,就像这种熟悉的形式“我从一位权威人士那儿听说……”。

因为证据的标准有时存在于提供消息的人本身,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判断提供给我们消息的人,是否真的知道他所说的情况。我们能肯定一位科学家在给我们说到他的专长时是不会带有谣言的。医生与外行的朋友们相比,不容易相信或传播有关神奇治疗方法或荒谬可笑的流行病方面的谣言。冲绳岛上的老兵,也比其他人不易相信或传播有关发生在该岛上的战斗虚构。虽然老战士在讲述一场战役时倾向于依靠他们的想像。任何人,在有关他们专业方面都有可靠,或相对可靠的证据标准,但对外行来说,通常难以判断他们的专业与公正程度。

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都是非专业的,谣言就因此而产生。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检验我们所听到的,是否背离证据的外在标

准,即使有时这些标准存在,也能得到。所以,我们抵御谣言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所有道听途说的描述持普遍怀疑态度。我们希望本书读者能形成谨慎的怀疑态度。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得益于 R.H. 纳普的经验,战争初期他曾为马萨诸塞公共安全委员会研究谣言问题。本书还承艾达和罗伯特·奥尔波特;多萝西·C. 波斯特曼批评指正。多萝西·L. 波斯特曼和西尔维亚·B. 科尔钦,洛兰·莱尔曼曾帮助编写本书。本书获得的例证一般都是由 Houghton 图书馆的阿诺尔德·韦伯格博士,罗斯·E. 塔格特先生,A. 拉斐尔·塞勒姆女士和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塔科布·卢森伯格博士提供的。我们还要感谢埃莉诺·D. 斯普拉格女士帮助编纂本书,感谢查尔斯·沃兹沃斯先生为我们画的用于谣言实验中的生动插图。

我们还要向下列出版社允许我们转载其出版著作中的例证或原文段落表示感谢,它们是:《铃声》辛迪加;Bobbs-Merrill 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E.P. 达顿股份有限公司,Houghton Mifflin 公司、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股份公司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并向下述机构和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致谢,它们是:美联社、波士顿《环球》杂志社、波士顿《先驱者》报社、纽约《先驱者论坛》报社、《纽约人》杂志社、《公共管理》杂志社、《公共舆论季刊》杂志社、《科学》杂志社和《锡拉丘兹邮政标准》。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时期的谣言	1
珍珠港谣言——谣言与国家士气——谣言防御——谣言攻势——武装力量中的谣言	
第二章 谣言为什么会流传	17
谣言的基本法则——散布谣言的动机——投射(指个人意愿、欲望等的外化)——谣言公式的归纳——谣言流传的间接原因——最后阶段的谣言	
第三章 评述与回忆	30
评述——感知、记忆、描述——个体与群体记忆	
第四章 一种实验方法	38
实验室方法——标准程序	
第五章 实验结果:省略与突出	45
省略的限度——突出	
第六章 实验结果:同化作用	65
不涉及情感的同化作用——更强烈刺激下的同化作用	
第七章 实验结果:推断	79
主题变换——虚构和添加——自发行为的结果——语言的误解——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孩子们的报告	
第八章 歪曲的基本模式	94
歪曲的三分模式的普遍性——创造性的添加——谣言是否都是假的?——夸张——虚构——凝缩——习俗化	
第九章 社会中的谣言	114

谣言和历史——谣言和传说——谣言的分类——热爱和憎恶的融合——谣言受众——耳语运动——报刊和谣言——贴着标签的谣言——谣言和幽默——谣言和骚乱——小结	
第十章 谣言的分析	147
谣言分析指导	
附录	168
有关部门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	

第一章 战争时期的谣言

在 1942 年和 1943 年那些紧张的日子里，谣言成了美国关心的重大问题。那时战争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了谣言产生的原因及控制它的方法。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完全正确，他说：“谣言在没有消息时到处传播，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而完全地提供给人们最准确的消息。”

确实，谣言在缺乏新闻时滋长。正因为人们确信政府将有关战争破坏性的消息准确地告诉了他们。他们知道了最坏的消息，所以，在纳粹空袭伦敦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并无蛊惑人心的谣言。当人们确信其知道了最坏情况时，他们往往不会再虚构更坏的谣言，因为那只会更添烦恼。

同时，也不难证明，在消息太充足时谣言也会满天飞。在报纸发表有关珍珠港灾难的正式报道之前，有关我们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的谣言并不多。虽然在 1944 年夏季，报纸披露企图暗杀希特勒之前，已有希特勒死亡的谣言，但更多的谣言是出现在报纸披露之后。1945 年 4 月底及 5 月初，有关和平谣言的泛滥，是与新闻机构中公开讨论德国即将崩溃同时出现的。类似地，在胜利日前夕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谣言的洪水席卷全国，关于战争结束的过早传闻传播太快，来不及正式否定。

谣言历史中奇特的插曲之一：在 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总统突然死亡的消息公开后的几小时内，便到处流传着许多著名人物死亡的谣言。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比尼·克罗斯比和拉

瓜迪来亚市长。如果公共事件没有新闻价值，一般也不会滋生谣言。在某种条件下，新闻机构越突出某消息——尤其是突发性消息，该消息便越要承受更多更严重的谣言歪曲。

战争情报局那位官员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谣言纯粹是一种情感产品，是可靠信息的代替物。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重要事件出现时，个人从来不只是认可这件事，他的生活深受影响。在他的意识里，事件的情感暗示产生各种幻想，他便寻求解释并想像不着边际的后果。

这位官员还不准确且过于简单地陈述了谣言传播与控制的部分程式。当事件对个人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而又缺乏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或即使有也使人在主观上产生分歧的时候，谣言便开始流传。这种分歧的原因有多种，有时是新闻没有清楚地报道，有时是听到有关该消息的相互冲突的描述，有时则因为个人对该消息的理解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尤其在战时，当人们不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消息时，谣言便会迅速蔓延开来。

珍珠港谣言

1942年1、2月，恐怖的谣言在美国泛滥。这些谣言的主题总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比当局公布的要大得多，还有些谣言宣称，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于12月7日全军覆没于珍珠港。更有的说，同一天有1000架飞机还没起飞就被毁。现在已经知道，珍珠港事件中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没有完全在官方的最初报告中公布，这可能是出于军事安全的原因。因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便产生了谣言。不相信新闻，公众没有可供核实与控制其可怕想像的事实标准。谣言流传如此之广，如此扰乱人心，以致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2月23日在炉边谈话时，认为有必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否认这些幽灵般的谣言。即使那时，总统

也不能将整个事件的真相全部公布于众。但他尽了最大努力，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公布了事实，以缓解人们的恐惧。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信心呢？我们将作简单的解释。

首先，让我们给出珍珠港事件的谣言程式，我们发现——如所有谣言那样——虽然事件对人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有关它的新闻却含糊不清。在该特殊事件中，这种含糊不清来自于当时起作用的三个条件：(1)许多人极不信任华盛顿政府，不信任它以前的改革，它的干涉主义，它的一系列机构及它的那些“长发专家”^①；(2)一般来说，人们不大相信战争期间的新闻政策，即使那些不反对政府的人也不完全相信官方公布的消息。在战争初期，怀疑也许有一定的正当理由。(3)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由于战争的到来而被完全扰乱：家庭支离破碎，计划被迫改变，前面是黑暗而不可知的将来。尤其是，那些不能确信我们有能力阻挡攻击甚至入侵的人们感受的恐惧更大。要解释这种恐惧，就必须找到一个貌似真实的原因。而手头最简单、最具体、最适当的一种理由，便是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差不多毫无防御能力了。因为除了珍珠港没有其他战斗，那么使我们无援的一定是珍珠港事件。相信具体的、近期的、戏剧性的理由比相信遥远的、不易于辩认的理由（即我们自己未能为国家防御作好准备）要更容易。这样，伴随一种“穷根究源”而产生的强大意识否定了接收到的这类新闻。^②

^①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存在着对官方消息发布的不信任，从下列民意测验可以看出：“你认为政府公布了公众应该了解的关于战争的信息了吗？”珍珠港事件后三天，只有68%的人准备回答“是”，回答“是”的人数量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波动，但从未超过70%，在1944年3月甚至低至51%。

^② 谣言传播最重要的心理根源之一，便是人们想理解并简化许多接踵而来、发展迅速的复杂事件的需要。谣言使事情变得比真实情况更简单，这种简化与理解的努力我们称为“穷根究源”。

谣言与国家士气

珍珠港事件的谣言和所有其他过分夸大军队损失的谣言，可归纳为恐惧性谣言。恐惧性的谣言，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总是比希望性的谣言要多得多。后者通常以预言战争早日结束的形式出现。据说伦敦的《劳埃德日报》曾引述说有十分之九的人认为战争将在圣诞节(1942年)前结束。有一则荒谬的小道消息，在全国广泛流传：一位预言家预言希特勒将在六个月内死去。听到预言的这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位预言家坚持己见，并说“是的，希特勒将在六个月内完蛋。这就跟你不久将在你的汽车上发现一具尸体一样将成为现实”。故事继续编道：不久，这位怀疑者在一次驾车外出时，在路边让一位受伤者搭车，在送他去医院的途中，却发现那人已死在他的车上。

这样怪诞的胡说竟然引起足够的兴趣而流传广泛这似乎是怪事。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可能死亡对传谣者很重要；二是因为他们希望希特勒早点死亡；三是围绕任何人死期臆想上的模糊性；四是希望本身需要自圆其说。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那个预言家成功地预测了汽车上的尸体，那么她关于希特勒之死的预言也是可信的。

恐惧性谣言，与希望性谣言一样，在战争期间对后方的士气有重要影响，前者因其令人担忧的特点，容易打击人们对己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念，它们招致不必要的焦虑，有时导致失败的观点。

而希望性的谣言，因其过分乐观的特点，有时导致削弱战斗力的沾沾自喜，由于得到盟军一系列胜利的消息，使人们放松战斗准备，结果导致献血人数的下降。当人们一旦相信有关即将到来的胜利或战争快要结束的谣言时，就容易放松努力，减少其

奉献。

尽管这两种谣言对国家士气影响很大,但与第三种谣言的影响相比还是相对轻的,第三种也是战时谣言中最多的一种:带来仇恨与敌意的——挑起分裂。

1942年9月《读者文摘》刊登了一篇名为《波士顿战争谣言四起》的文章,后面印有一份问卷。它给出了1942年夏天,从全美国收集到的1000种谣言的百分比分配。

分析表明,1942年夏天的所有谣言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怀有敌意目的,造成分裂影响。大约有9.3%的谣言是反犹太人的,3.1%反黑人,21.4%反当局,19.6%反陆军和海军。一股连续不断的抱怨和指责的浊流对准了美国同胞的团体,而他们实际上都在为战争胜利作出牺牲。这类谣言只会在关键时刻损害民族团结。谣言的受害者被激怒,当他们最不被宽恕的时候,怀疑与反斥成为普遍现象。

谣言防御

不难明白,为什么政府官员和爱国公民十分警惕谣言对后方士气的潜在损害。虽然他们相信传播谣言,是战时紧张不安的一种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症状,但他们也不知道谣言在国内滋长失败主义、冷淡情绪或在国内制造混乱方面起多大作用。

1942年Ruch和Young就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作了一项战时研究。通过提问对象,认为谣言是否真实(不论其以前是否听说),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纽约市平均信谣率是9.4%,波士顿为3.8%,事实证明,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中比富人中更高;45岁以上的人中比年轻人高,犹太人中比非犹太人中高。这次调查表明犹太人易于相信谣

言,这也许可归因于如下事实:谣言主要是“让人恐惧的”那种,在战争初期,这容易引起许多犹太人的不安全感和担忧。

政府机构广泛吸取全国公众的意见,意识到破坏性谣言传播的危害,但采取什么措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总统亲临电台否认一则特殊谣言。还有一次,在战争后期,他又明确指出,谣言反映了种族和宗教仇恨,要努力制止它们的传播。历史短暂的统计局的《分裂与征服》及其他出版物是谣言的“解毒剂”。有一小段时间,战争情报局委派它的一个下属单位专门控制谣言。

这个机构不同于私人组织的“谣言门诊部”。谣言门诊部集中精力驳斥错误的谣言,而战争情报局则信赖“谣言在缺乏新闻时传播”这种准则,并集中精力提高新闻质量,增加公众对新闻的信心。虽然战争情报局对为驳斥谣言而重复谣言的做法表示怀疑,但它并不干涉大众化报纸谣言诊所的工作。战争情报局所持的观点是,用事实制止谣言胜过单纯的反驳,免得在反驳过程中,反而使谣言过度流传。谣言诊所的看法则相反:除非给他们指出来,人们一般不会看到事实的相关性。指出谣言并猛烈批评则是上策。两种机构也许都错在过分依赖事实与逻辑。情报与争议不足以消除那些滋长恐惧与仇恨的谣言。当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指控犹太人逃避兵役,后来又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犹太人按照他们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服了兵役,他会怎么做?他只会改变谣言的内容(而不是敌对情绪),他会说“对,但他们在军队里干的都是轻松活”。因为不可能测定军队中谁干“轻”活,谁干重活,所以也就不可能驳斥了,即使驳斥是有用的。要堵住有动机的传谣者的嘴,光有正确的信息与逻辑是不够的。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极权主义国家),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机构,都有责任尽自己的努力呼吁公民保持理智。

政府情报机构运用了许多间接办法对付谣言,公布了有

关事实。用标语牌和宣传小册子呼吁民族团结；联邦调查局与陆海军的情报机构暗中调查，追查那些极为恶毒谣言的踪迹。

战争情报局在谣言问题上所做的最大努力与该问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有关，称为“情报安全”。它生产并散发了许多醒目标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Zip your lip and save a ship（闭上你的嘴，挽救一条船）”。不负责任的谈话减少了，令许多观察者感到惊奇的是，连一些老百姓也学会保守战争秘密了。

虽然，情报安全的战役无疑是成功的，但人们发现，要设计一种防止那些更不好下定义、更阴险谣言的方法并不容易，这类谣言往往有暗中制造分裂，削弱人们斗志的特点。

谣言诊所的努力是广为人知的，启用这种新闻防卫武器的功劳当归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的 W.G. 加文先生，他在 1942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间，在当地心理学家及其他热心公益人士的帮助下，编辑了一种星期特刊。这个主意引起美国和加拿大的 40 多家报纸与许多杂志的注意及仿效。通常揭发的谣言是类型简单，回答简明扼要，但偶尔，如下面的例子所示，是由一位心理学家写专栏文章，对专业知识的一些片断作一个通俗的解释，让人们清晰了解那些更复杂、更危险的谣言。

谣 言 诊 所

请体贴陆军妇女队队员

今天的谣言诊所由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主持。

几则破坏性的流言蜚语比目前流行的有关陆军妇女队队员的错误谣言，给你们谣言诊所带来的惊愕更大。这里有几个例子。谣言：“500 多名陆军妇女队员非法怀孕被军队遣返”；谣言：“500 名怀孕陆军妇女队队员从北非返回”；谣言：“艾森豪威尔将军说，陆军妇女队队员是他最大的烦